



新诗研究丛书



“新诗集”与 中国新诗的发生

Xinshiji yu

Zhongguo Xinshi de Fasheng

姜涛 著



“新诗集”与 中国新诗的发生

Xinshiji yu
Zhongguo Xinsi de Fasheng

姜涛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新诗集”与中国新诗的发生/姜涛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
2005.5

(新诗研究丛书)

ISBN 7-301-08515-X

I. 新… II. 姜… III. 新诗-诗歌史-研究-中国 IV. I207.2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29735 号

书 名:“新诗集”与中国新诗的发生

著作责任者:姜 涛 著

责任编辑:高秀芹

标准书号:ISBN 7-301-08515-X/1·0713

出版发行: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:pkuwsz@yahoo.com.cn

电 话: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

排 版 者: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: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新华书店

650mm×980mm 16开本 18.5印张 270千字

2005年5月第1版 2005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24.00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新诗研究丛书·出版说明

推动中国新诗研究的深入开展,出版相关的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,是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工作重点之一。为此,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,拟定了组织出版“新诗研究丛书”的计划。丛书的选题主要是:

- 一、新诗理论研究;
- 二、新诗史,包括断代史、流派史、诗刊史等;
- 三、诗歌文本阅读和重要诗人研究;
- 四、新诗文化问题研究;
- 五、有价值的新诗研究资料;
- 六、其他。

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

新诗研究丛书编委会

2005年4月

序

温儒敏

姜涛的这篇论文重新审视了“新诗的发生”这个课题。本来这也不是什么新题目,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已经不少。翻开许多现代文学史,或者新诗史著述,所看到最多的还是对新诗发生发展轨迹的勾勒,诸如草创、奠基、拓展、衍变、高潮、深化等等阶段的划分,就成为描述新诗演进过程的一种常见的“叙事策略”。尽管在这种进化描述中也会注意到不同的诗歌流派之间的互相扬弃、递进、交错与组合,但研究者一般都还是相信诗歌的演化总会依照一定的规律,曲折地顽强地向着某个理想的审美目标趋近。这种线性叙事对于文学史知识的积累传授可能比较实用而奏效,但在获得历史叙述清晰感的同时,也往往忽略了文学史上共时情况的复杂性与多样性。对于像诗歌创作这样格外依仗个性、灵感等偶然因素的文学现象来说,线性描述和规律抽取的方式就会牺牲更多“文学的丰富性”。

姜涛这本书也是谈“新诗的发生”,但多了一些对线性勾勒“盲点”的警惕。该书绕开那种从观念到观念,从文本到文本的套路,除了对新诗的历史与审美的研究,又特别引入所谓“文学经验研究”的讨论,譬如新诗的结集、出版、传播、阅读的环节,及其在新诗“合法性”建立中的作用。该文重点考察了新诗“结集”对于现代诗歌如何形成气候,如何站稳脚跟的实际作用,其中有关新的诗歌阅读行为的培养形成,以及缠绕其间的历史复杂性,论者都有许多新的发现。这些讨论的意图是尽可能回到新诗发生原初的现场,从共时的层面展现错杂、丰富的历史样貌。

该书不是完整的新诗发生史,作者的目光集中在“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”,就是要以新诗如何结集、出版、传播、阅读等等现象的考察,来讨论新诗发生的复杂机制,包括其背后容易被人忽略的许多文学社会学

因素。当我们从书中读到新诗自我建构和扩张背后的许多复杂的“事件”，了解新诗的成立除了自身观念、内容和形式的变革，还有赖于在传播、阅读及社会评价中不断塑造自己。新诗的发生不止是新诗的创作，也还有新诗对阅读空间的开辟、读者的“训练”，以及“新诗经典”的打造。这样，我们就会对以往所获得有关新诗发生“常识性”历史想象提出质询。能够引发这样的质询，正是这本书成功的地方。这种质询不但丰富了对现代文学产生历史过程复杂性的认识，也可能会启发我们反思以往习以为常的研究范式，开启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和新的思路。对于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来说，能够达到这种创新的“境界”实在不容易，也实在可喜。

现在有关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著作出版很多，但大部分都是套路雷同。有的书只要翻开目录看看就知道，其切入的眼光与提出问题的框架到底是否在创新。我的经验是，那种观点排列齐整讲究，线索描述流畅清晰的文章，可能是中规中矩的“好文章”，却不见得是真正有创意有见地的论作。文学史研究适当保持一点“模糊性”，多关注“常识”所可能掩盖的特殊性，多一些反思与质询，也许更能接近真实。

这本书所讨论的“新诗的发生”，也引起我一些联想。我想起三年前，在南京参加关于“现代文学传统研究”的学术会议时，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貌似普通的问题，竟引起热烈的讨论。我提的问题是：设想一位从事现当代文学的学者，自己是喜欢新诗的，但是如果他有一个五六岁的儿子，要培养孩子读一点诗，不用说，也会是李白、杜甫、王维等等的古诗，而不大可能让孩子去念新诗。这是为什么？会上大家谈到许多原因，包括艺术形式、审美习惯、对于经典的崇拜，等等，但较少注意最常见的文学社会学的原因，譬如“阅读行为”的养成，传播方式，以及新诗和旧体诗的“功能”差异问题，等等。新文学所造就的普遍的审美心理、阅读行为和接受模式，显然都是不同于古代文学的。新诗虽然也有追求格律和音乐性的，但已远不如古典诗词和音乐的联系那样密切。旧体诗的欣赏有赖吟唱，不加诵读，那韵味就出不来，这就决定了旧体诗在接受心理与阅读模式。而新诗则似乎主要是“看”的诗，依赖吟唱和朗诵是越来越少了。这种以“看”为主的阅读行为模式，反过来也会

制约和影响到新诗的艺术发展。如果这种看法成立,那么就不难解释,为什么现代文学学者也习惯于让孩子“诵读”古诗,而不是“看”新诗了。也许孩子到了高中和大学,又会有一段特别迷恋新诗的时期。这其中也有文学社会学的因素。对诸如此类现象如果不满足于做一般的推论,而是运用文学社会学与文艺心理学的方法,对新诗的得失以及作为“传统”在当代的延伸,进行细致的调查和深入探讨,我想也是挺有意思的。

姜涛原来是清华工科的学生,因为喜欢写诗,转入清华和北大的中文系先后读硕士与博士学位。他具有较高的文学才华,又有创作实践,对“新诗生产”的复杂性也有切身的了解,这些都有助于他深入探讨这样一个涉及文学生产与传播的课题,并取得成功。他的这篇博士论文答辩时获得评议专家的高度评价。作为导师,我在与姜涛讨论这个课题时也学到不少东西。我真心希望姜涛能够再接再厉,写出更多能体现新一代学人锐气和识见的学术论作。同时我也非常乐于向读者推荐这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。

2004年2月24日于京西蓝旗营寓所

目 录

序.....	温儒敏(1)
导言 研究方法、对象的提出	(1)

上 编

第一章 “新诗集”与新诗传播空间的生成	(19)
第一节 从书信到成集:新诗传播空间的形成.....	(20)
第二节 支撑诗坛的“新诗集”	(27)
第三节 公共传播与现代的诗歌想象	(30)
第二章 读者、时尚与“代际经验”.....	(48)
第一节 新诗读者的构成	(49)
第二节 作为阅读时尚的“新诗集”	(53)
第三节 “代际经验”中的《女神》	(57)
第三章 “新诗集”出版与新诗坛的分化	(69)
第一节 “新诗集”与“新书局”	(69)
一 《尝试集》序列与亚东图书馆	(71)
二 《女神》与泰东图书局	(75)
第二节 由诗集出版看新诗坛的场域分化	(78)
第四章 “新诗集”与新诗的阅读研究	(98)
第一节 读者分类与新诗的“读法”问题	(98)
第二节 对三本诗集的讨论:从“读法”的角度	(102)
一 为胡适改诗:胡怀琛的“读法”	(102)
二 “选本”中的新诗评价:读者的眼光	(109)
三 从《三叶集》到《女神》	(113)

下 编

第五章 “新诗集”对新诗的呈现(一)	(127)
第一节 胡适新诗构想的三个层面	(127)
第二节 《尝试集》对“新诗”的塑造	(133)
一 序言与编次:“诗体解放”的定位	(134)
二 成集中的“自我净化”	(138)
三 题名:“尝试”申说	(142)
结语 “新/旧逻辑”中的新诗	(143)
第六章 “新诗集”对新诗的呈现(二)	(153)
第一节 胡适眼中的“新诗集”	
——以《草儿》、《冬夜》、《蕙的风》为中心	(153)
第二节 “诗话语”的凸显:《冬夜》、《草儿》序言的	
考察	(158)
第三节 选本中的新诗想象:对“分类”的扬弃	(164)
第四节 《女神》成书与新诗的重塑	(168)
一 从日本到上海:作为出路的“新诗”	(168)
二 《女神》编次中的“自我定位”	(172)
第七章 论争中的“新诗集”:新诗合法性的辩难	(184)
第一节 《评〈尝试集〉》——学衡派的反动	(186)
第二节 《蕙的风》的论争——对一桩旧案的重审	(192)
第三节 《湖畔》与“经验范围”的争议	(197)
第四节 对“新诗集”的整体性批判	(202)
第五节 “新诗”与“诗”:合法性辩难的展开	(211)
第八章 “新诗集”与新诗历史起点的驳议	(232)
第一节 作为新诗合法性起点的《女神》	(233)
一 最初的接受:“诗美”的满足	(233)
二 “激情”的解释:抒情本体的确立	(236)
三 诗人形象:特殊人格的追寻	(239)

四	从“近代情调”到“时代精神”	(245)
第二节	新诗史上的《尝试集》和《女神》	(249)
一	从“共时”的对峙到“历时”的进化	(249)
二	张力结构的消除：新诗发生历史线索的形成	(254)
结语		(268)
参考文献		(271)

导言 研究方法、对象的提出

在现代文学研究中,新诗研究一直是个相对独立的领域。新时期以来,出于对单一政治标准的反拨,在探究历史本来面目的呼声下,对新诗史上众多备受争议的流派的挖掘、整理和重新评价,应该说是新诗研究兴起的起点。一批学人突破禁忌,通过细致资料搜集、作品分析,首先使被尘封的新诗历史重新浮现出来。当“平反”式的讨论渐趋沉寂,对新诗的审美追求以及新诗史内在线索的关注,便上升为研究的主要动力。在资料挖掘的基础上,新诗的流派构成、潮流演进、内部传承、外部影响、代表性诗人、理论批评、历史脉络等问题,都得到了细致的探讨。尤其是有关“现代主义诗潮”的探讨,更是新诗研究中着力最多,成果最丰硕,显露的时代特征最鲜明的部分。在某种意义上,以流派研究为框架,以语言、形式、观念问题为核心,以中西融合的现代追求为理想的讨论模式,已成为新诗研究的一个主导性的“范式”,潜在地支配了大多数研究的展开,其最终指向的,是完成对新诗历史的完整构想:它被描述为一幅由多种流派的彼此交错构成、具有内在的独立展开线索的动态图景。^[1]

“范式”的存在,使得新诗研究具有很强的历史连续性。20年来,新诗研究在现代文学的学科格局中,自成体系,形成一套自足的方法、问题和框架。然而,在取得丰硕成果,获得自足性的同时,还应注意的是:“范式”的稳定,或许同时带来了某种封闭性。一个突出的表征是,虽然相关的研究在不断推进,课题也在不断细化或深化,但在知识积累的意义之外,内在的超越和突破,却很难获得。近年来,有关新诗的论文数量仍在增加,但视角的单一、方法的陈旧,以及观点雷同、材料重复所造成的“拥挤”,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当其他领域的文学研

究不断拓展边界、重置研究的内在动力时,曾一度令人激动的新诗研究,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断向边缘位移,在“特殊”、“独立”的位置上,似乎愈来愈缺少与当下思想、文化对话的活力。在这种情境下,发现新的研究角度,扩张研究的领域,当然是必然的出路。近年来,新诗研究中一些新思路的引入,已体现出了超越既有“范式”的努力,如对新诗流派与杂志传媒及城市文化的关系考察,从语言形式角度入手的文本细读,新诗经典化过程的考察,以及在主流的“现代主义”诗潮研究之外提出的“现代性”框架等,都从不同的方面,拓展了研究的视野。但除此以外,对上述“范式”本身的检讨,也是应纳入考虑的工作。

其实,从历史实践的角度看,任何范式、框架都不是可以脱离具体“使用”的自明性存在,其发生、展开总是受特殊的历史条件、语境的制约或鼓励的。在20世纪80年代,伴随着对庸俗社会学批评的摆脱,在某种抗辩的热情中,现代文学学科的性质、品质也发生相应的转化,无论是历史的还原,还是对审美以及文学史规律的强调,都意在与原有政治格局的论辩中,建立起学科的自主性,而对纯粹“文学性”以及“文学现代化”的向往,也与当年整体性的历史逻辑相关。上述所谓新诗研究的“范式”,正是在这一背景中的,其活力和有效性,也是依托于当时的历史要求的。无论是对诗歌语言风格、诗人创作个性的关注,还是对现实主义、浪漫主义之外现代主义诗潮的“偏爱”,都呼应着当时的整体性文化逻辑,可以看作是一种广泛的思想、文化自我建构的一部分,在强有力地“还原”了被遮蔽的新诗历史之后,崭新的问题空间也由此形成。

然而,当“范式”的合法性被充分认可并被广泛接受,最初新锐的发现,往往会被普及化为一种“常识”;而社会、历史以及精神氛围的变迁,又使“范式”得以存在的历史依托,渐渐失去了背后的现实针对性。由此而来的可能结果是,原本清新、尖锐的问题意识,会在学术的生产、再生产的环节中悄然流失,所谓的“范式”,也难免沉积、固化为某种制度化的“流程”。新诗研究“封闭性”的产生,与研究“范式”的这种沉积、固化,无疑有着紧密的关联。因而,要重新唤起新诗研究的活力,能否在稳定的“范式”中引入反思的因素,将既定的前提、结论“历史化”,或许就是关键所在。

当然,“反思”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,需要在新诗研究与当代文化变迁的重重纠葛中展开,而且“反思”不意味着“推倒重设”,某种整体性的“替代”,在目前的情况下,不仅是极其困难的,而且也是无意义的。从现实的角度看,更为有效的反思,还是应在具体的研究中展现。只有通过一些具体的诗歌史问题的检讨,通过研究中思考角度的暗中更换,对既有范式的“抵制”或“改写”,才可能会更为鲜活地呈现,而这一点也正是本书的研究所试图实现的。具体而言,“反思”将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。

二

首先,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在纯文学话语不断高涨的情况下,关注文学审美品质的内部研究,成为文学研究中被再三呼唤的思路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某种内在的矛盾也暗中发生。一方面,现代文学的展开,本身就是现代思想、文化、政治复杂建构的一部分,有的学者就曾这样说:“纯粹的美学兴趣当着遇到了如中国现代文学这样的对象,难免会感到了失望。这不是那种经得住一再的艺术探险的文学。”^[2]另一方面,通过文学的研究来探索人的现代化、文化启蒙、知识分子身份和使命等命题,这应该是一代学人研究的起点和抱负所在。因而,在现代文学的宏观研究、以及小说这样的“中心文体”研究中,虽然基于叙事学理论的形式分析一度十分时兴,某种由内而外、内外交错的现象常常发生。譬如,在赵园著名的知识分子研究中,“知识分子形象”似乎首先不是一个叙述层面上的形象学问题,而是作为一个“精神结构”,一种“意识现象”来把握的,从中得到辨认的20世纪精神史、文化史的走向。由此一来,关于文学本体的内部研究,在20世纪80年代,在很多情况下,似乎更多停留在呼吁的层面,并没有被认真地落实。

然而,对于新诗研究而言,这种内、外冲突带来的“盲视”(或是“洞见”),似乎并不存在。在具体史料搜集和历史还原的基础上,无论是诗学观念的辨析、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,还是传统与现代、西方影响与本土特征关系的把握,“内部”的审美研究,一直是新诗探讨的主要着眼点。不仅如此,“内部研究”也向研究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:不仅传统的

印象式的审美感悟力,被看成是新诗研究者必需的素质,对复杂精微的形式、观念的敏锐辨析力,更是被普遍呼吁的能力。一方面,这与新诗本身的艺术成就和形式复杂性相关;另一方面,某种文类之间的等级,也暗含在其中。从“文学性”的角度看,在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戏剧等门类中,因为表意方式的独特和“纯粹”,诗歌似乎体现了文学性的尖端。因而,较之其他文类,“新诗”更集中地体现了现代文学的审美诉求,以及在语言形式上的现代探索,它的文体独立性也更加鲜明。如果与同一时期小说研究不断向外拓展、容纳思想史和文化史因素的倾向相比,向某种诗歌“本体”的收缩,似乎是支配新诗研究的主要趋势。

应当说,这一思路的确吻合了新诗的文体特征和历史实际,研究的合法性不容置疑,新诗的独特价值,也恰恰表现在这一方面。而且纯粹的内部研究,尤其是摆脱印象式的鉴赏,针对新诗文本形态的深入考察,目前还有相当大的空间。但可以追问的是,特殊化、纯粹性的趋向,与其说是具体的文体规约,毋宁说是一种普遍的阅读期待,一种受惠于浪漫主义—现代主义传统的制度性想象。与之相关的公共与私人、社会与心理、政治与诗歌、社会与个人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结构性对立,则是现代文化的前提性结构。由此而来的结果是,与小说、戏剧等文体相比,诗歌似乎不适合于外部的社会学分析,因为其处理的更多是主观的、或情感方面的经验,如彼埃尔·V. 齐马在谈及“抒情作品的社会学”时所描述的:

许多理论家过去(和现在)认为抒情诗倾向于“主观性”和“情感”方面,几乎不适于进行社会学分析:在大多数情况下,它既不表现社会也不表现历史事件。它最常用的题材不是政治家、工会运动、罪犯或秘密组织,而是情人、大自然和孤独。^[3]

如果一味地依从这样的制度性想象,是否会带来某种削减,暗中阻碍了思考、研究的自由扩张,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
新诗,作为新文学整体方案的一部分,其社会性和历史性不能忽略,它的生成与展开,同样处于20世纪中国复杂的历史、文化进程中,在具体的“现场”中,新诗的传播接受、文化定位、读者样态以及文学史

塑造等等外部环节,与其历史形象和内在性质,都有着深刻的关联。单一的“内部研究”似乎无法将这些关联完全说明。其实,对所谓文学研究“内部”与“外部”之区分的反省,已经介入到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辨中,而对文学生产、体制等外部环节的考察,也正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点。如果将“新诗”放回这种整体的视野中,那么超越内外之别,打破“制度化”的单一格局,无疑是值得尝试的方向。

其次,与内部研究的单一格局相关的,还有研究对象上的某种不均衡状态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,随着研究前提的重设,那些能够体现所谓新诗的“艺术价值”,又曾一度被历史遮蔽的流派,诸如新月派、象征派、现代派、九叶派等,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,其中的“现代主义”诗潮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,几乎占据了目前新诗的主体。^[4]不均衡的状态,也表现在研究的时段上,譬如,相对于流派迭起的三四十年代,新诗发生的20年代初,就似乎因为只具有发生、过渡的意义,而处于被冷淡的状态,较少被当下的主流研究涉及。当然,上文已言及,对“政治标准第一”的反拨和对文学现代化的向往,是这种研究趋向背后的动力。但有意思的是,在主次、轻重的秩序划分背后,某种划分的依据、尺度也被凸显出来。这一尺度,一般被表述为“诗”的标准。表面上看,这是一个宽泛的说法,表达的是一般读者对“诗”的特殊期待,比如诗境的含蓄、语言的优美、鲜明的抒情意味等,但应该注意的是,所谓“诗”的标准,并非一个本质性概念,它的确立既是一般审美期待的结果,也与现代“纯文学”观念的塑造、规训相关。如果这一“历史化”的标准被非历史地使用,并落实为具体的研究、评价尺度,新诗历史展现的多种可能性,便有可能被忽略到中心的线索之外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,在“诗”标准的颁布中,某种“目的论”叙事也随之被暗示,即新诗的发展是依据一定内在规律,向着某种审美理想趋近的过程。在这一“目的论”叙事的支配下,从工具意义的革新,到纯粹诗美的营造;从形式问题的探讨,到内在体验的发生,从与传统的断裂到与传统的融合,从写实到浪漫再到现代,一种历时性的线性发展眼光,始终伴随着新诗研究的展开。可以说,对某种内在演进、辩证发展的逻辑的强调,已成为新诗史描述的一个主要趋向。^[5]然而,需要追问的正是,

逻辑的展开能否等同于历史的本然,新诗的发展是否有内在的辩证规律,新诗史上共时的交错、偶然和矛盾,能否在历时的线性叙述中被有效呈现。正如韦勒克所称,在处理文学史上的“演变”观念时,“必须抛弃轻易得出的解决方案,并且正视现实中的全部具体浓密性与多样性”^[6]。在这个意义上,检讨新诗的相关历史叙事的起源,开掘在历时线索构造过程中,对复杂表象的擦抹,也就成了另一个反思的指向。

本书的研究思路,正是在上述两方面背景上提出的:首先,在方法上尝试绕开从观念到观念、从文本到文本的既有模式,在新诗的内部研究“范式”中,引入一些对外部环节的讨论,譬如发表、出版、读者阅读、诗集编撰和文学史的建构等,在一般的历史研究、审美研究中加入“经验研究”和文学社会学的因素,即“研究的客体不仅包括文本本身,而且包括文学体系中文学活动的角色,即文本的生产、销售、接受和处理”^[7]。其次,尽量回到原初的现场,通过从共时的角度展现错杂、纷乱的历史表象,从而对一般的有关新诗的线性历史想象,提出自己的质询。在研究时段的选取上,本书将讨论的焦点,投向在新诗发生的初期。虽然从文本成就上看,这一时期新诗的美学成就不及后来,但“新诗”的社会传播、接受模式,以及有关其合法性的历史想象,都在此一时奠基成形,其中包含的研究可能性,也要比一般理解的远为丰富。

三

上述言及的,只是方法上、时段上的一些设想,而标题“新诗集与新诗的发生”,就是本书“锁定”的话题。顾名思义,这项研究包含两个层面:一是研究的对象(新诗集),一是处理的主要问题框架(新诗的发生)。从“新诗集”的角度,讨论“新诗的发生”背后的社会条件和理论内涵,就是本书想要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。

有关初期白话诗(或早期新诗)的历史评价,一直是个聚讼纷纭的话题。最早有胡先骕、章太炎、李思纯、梅光迪、吴宓等人,对白话新诗的历史合法性进行质疑;继而,又有成仿吾、梁实秋、闻一多、穆木天等人,从新的视角出发,抨击初期新诗违背了“诗”的原则,这种攻击之声一直延续到当代,郑敏在著名的“世纪末回顾”中,更是将胡适等人推上

审判台。^[8]当然,在新诗史上,为初期新诗正名和辩护的声音也一直存在,朱自清、苏雪林、茅盾等人的言论就是其中的代表,80年代以后更是出现了一系列的“重评”之作,但其价值也更多地被定位在历史的开端和工具的过渡上,20年代的诸种批评,已沉积成文学史的基本判断,即早期“新诗”虽然完成了语言工具、诗体形式的变革,但也造成了诗意的匮乏和诗美的放逐,后来的新月派、象征派、现代派等诗歌趋向的出现,才使新诗走上了艺术的正轨。从上述判断中不难看出,“新诗的发生”主要被处理成新/旧的交替这一“线性”过程,无论是否定还是辩护,都在这一框架内展开。然而,值得追问的是,作为“原点”的丰富意义,新诗发生内部交织的微妙张力,也有可能“流畅”的叙述中,被悄然抹平。

近年来,也有研究者试图突破上述框架。致力于新诗的“现代性”研究的臧棣就提出:新诗对现代性的追求本身,已自足地构成了一种新的传统,即从根本上说,新诗的现代性不是一个继承还是反叛传统的问题,而是要在传统之外提供一个越来越开阔的审美空间^[9]。这种提法的启发之处在于,一种虚拟的却绝对化的连续性,在他那里被拒斥,它将论述的重点移至新诗自身的现代性追求上,从而巧妙地绕过了仅在传统与现代关系(或继承或反叛)中思考新诗前途的模式。这一提法同时也暗示了另一种考察角度,在历时性的断裂(或连续性)框架之外,是不是可以从一种“共时”性角度,展示“另一个审美空间”的内部构成。

当所谓的“内部构成”进入讨论的视野,一个关键性问题便凸显出来了,即“另一个审美空间”,不只显现在美学、形式层面,而是包含着更多社会、历史因素,也显现在一种社会建制的层面。新的美学可能的产生,与文学的生产、接受方式的变化息息相关,正如伊格尔顿在谈到文学形式与生产的关系时,所指出的:“一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艺术生产方式——是成千本印刷,还是在风雅圈子里流传手稿——对于‘生产者’与‘消费者’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性因素,也决定了作品文学形式本身。”^[10]从这个角度看,新诗现代性的生成,其“空间”的自足与独立,作为一项复杂的历史建构,是呈现于文学的现代生产、传播、接受方式的整体变迁中。在美学的变革之外,它还涉及到诗